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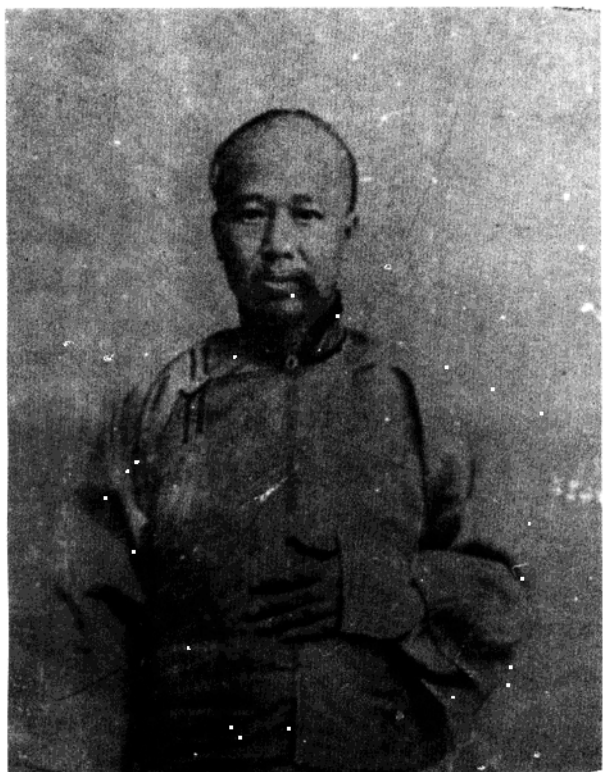
康有为在西安

●单演义遗著 ●单元庄整理

果得詞梨勒

眼親描壽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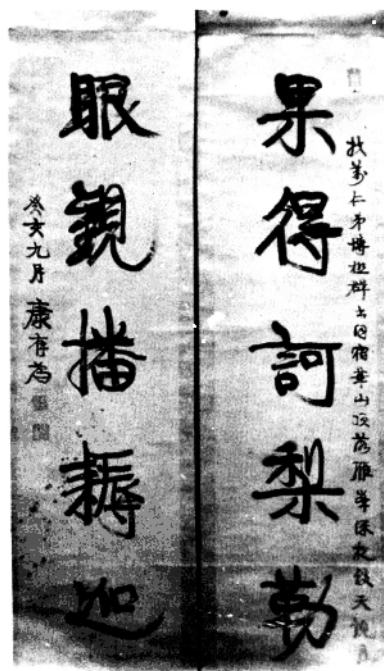
陕西人民出版社



康有为像



康有为手迹之一



康有为手迹之二



康有为手迹之三



康有为手迹之四

康南海先生與余談話錄

康南海先生第一次講演

門人 張一鵠 筆記

南海先生日前蒞陝，各界歡迎，咸請講演。督軍兼省長劉雪雅於十一月十四日，即夏曆十月初七日，邀軍署暨嵩軍總司令部全體各師長統領，省署政務財政教育實業各廳長，審檢各廳警務督察各處，及省內局所各全體，同假易俗東社，請先生講演。是日下午一時，萬君自逸、李君逸門、鄧毅紀、後張鵬一隨先生乘汽車蒞止時，雪雅督軍率軍政法警局所各官長，近於社門軍警軍槍軍樂齊奏，諸官長魚貫入座。先生起而言曰：「圖中爲周秦漢唐故京數千年第一文化之區，鄙人想慕已久，頃承劉雪帥盛意，遠道招請，又過承諸君殷勤厚意，今日歡聚一堂，私心非常感喜。欲與諸君暢談平日見聞而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然人自天生，今先言天人之故，何如？莊子謂人之生也，與憂俱來。故有身即有一身之憂，有家即有一家之憂，有國即有一國之憂，凡爲家人者，處環堵之中，有父母兄弟妻子之樂，即有父母兄弟妻子之憂。」

康南海先生講演錄

一 教育圖書社印

⑥ 康有爲之《演說集》

前 言

本书记述了在中国近代史上炳赫一时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片断——1923年来西安游览讲学的情况。这段历史鲜为人知，亦不多为史学界所重视。然而，这段轶事，既是康有为后期政治与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缩影，又是他前期激扬于政坛、变法维新，力倡君主立宪活动的继续。因此，“补白”这段历史，对全面了解康有为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出生于广东南海县一个官僚大地主家庭。其父达初曾任江西候补知县，祖父赞修曾任连州等地的教谕、训导；叔祖国器因追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擢为广西布政使；另一叔祖懿修曾为七县团练之首，是独踞一方的豪强势力。出生在这样的封建地主家庭中，使康有为与农民阶级之间横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未能给少年时代的康有为以明显的影响，而家庭的陈腐教育，却使他的思想自幼深植于封建宗法文化的土壤之中。此后，即使当时代变革的浪潮推动他面向西方探求真理和发出反叛的呼喊，成为维新派的领袖时，这种旧根基仍死死拖拽着他，使他只能成为改良派的代表，成为集进步与保守、资本主义新思潮与封建传统旧观念于一身的矛盾人物。在他的身上曾披着维新时代的曙光，同时在身后却又拖着一条浓重的封建时代的阴影。

7-1-22/0 9

18岁以前，康有为接受的是封建正统思想的教育。1876年他就学于广东大儒朱九江。朱九江疑经求实、反传统、倡革新的经世济人、学以致用的思想，给康有为极大的影响，逐步培养了康有为极强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清廷的昏庸腐败、内忧外患的刺激和老师的训导，使他毅然捐弃汨灭性灵的正统学说和无用的八股科举之学，由博采“利于精神解放”的陆王心学，进一步潜心于与陆王心学相通的佛学经典。这时，他的思想已潜移默化地趋附于时代的革新潮流。

1879年，康有为结识了翰林院编修张延秋，开始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在途经上海、香港时，他深为近代资本主义的进步思想所吸引，认为西方“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源”，遂即大购西书，希望从西方寻得救国的真理。中法战斗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全面改革内政，保护民族资本和分享权力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政治与思想的氛围中，以1887年的《人类公理》为标志，康有为的颇为复杂的世界观体系初步形成。这一体系中既包含了以气为体、以阴阳为用的进化发展的自然观，反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仁为主”的人道主义人生观，又夹杂了中国古朴的民主思想和反封建意识，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它尽管披着庸俗进化论的外衣，却成为进行改良维新宣传及政治活动的思想基础。

1888年，康有为不顾人微言轻，第一次上书皇帝要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改良政治。由于顽固势力的阻挠，上书未达，反招致了种种非难。这使他意识到，要改良政治，革除陈法，首先必须推倒顽固守旧势力，特别是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封建正统学说，用新的思想取而代之。这是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维新改良思潮所面临的重大使命，也是康有为决计回故里讲

学，进行理论建造和舆论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动因。

1889年冬至1890年春，与今文经学家廖平的晤面，对康有为的改良维新思想与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1891年完成的《新学伪经考》中，他接过廖氏关于古文经学皆为伪作的结论，以学术考证的形式，对在中国统治了二千年之久的正统学说公开发起进攻，企图在日益腐败坍塌的封建伦常的基础上，树立资产阶级理性追求与理想制度的大旗。在继作《孔子改制考》中，他进一步将孔子打扮成“社会改革家”，把公羊三世之说宣布为孔子改制的“微言大义”，把公羊通三统、张三世之说与《礼运》“天下为公”的思想及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借对孔子“微言大义”的阐发，宣扬“历史进化论”、“民权平等”思想以及“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论证了中国社会将由封建专制的“据乱世”进入君主立宪制的“升平世”，最终达到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太平世”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孔子改制考》中，他还企图以“布衣改制”作为组织、团结士大夫群众的旗帜，使托古改制主张转化为布衣改制的实际行动。

如果说《新学伪经考》如“大飓风”，猛烈地摇撼了封建专制制度和正统守旧势力的理论根基，那么，《孔子改制考》则宣告了大变动的顺乎天理，烘托出了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家和爱国志士所要建立的理想王国的蓝图。两篇论著总几十年托古改制维新思想之大成，建立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

然而，一切思想无不打有时代与阶级的烙印。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不可能同封建正统学说作彻底决裂，并使他不得不运用“使死人复生”来“赞美新的斗争”的方式，“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

经崇拜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语）。这一历史的局限在维新运动之初就埋下了保守与倒退的种子，并在他的全变、速变、大变的战斗呐喊中隐含着机械进化，循序渐变，不得躐等，进而否认革命的消极因素。

1895年5月的“公车上书”运动，成为维新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转折点，康有为自此名扬天下，成为维新运动公认的领袖。

自1898年初起，康有为的政见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并部分地加以采纳。他的主张，如在政治方面，提出“拟定宪法，开国会”，“君民共治”，试图建立资产阶级改良政体；在经济方面，建议“振兴商业、农务、工业”、“劝励工艺，奖募创新”、“举办邮政”、“开矿筑路”、“保护民族工商业”；在军事方面，建议“力行保甲、举办团练”、“练海陆军以强中国”；在文化方面，建议“废八股试帖楷法为策论取士”、“翻译西书和日本书”、“废淫祠设学校”、“派人留学”、“开放报馆”等。这些政见和由光绪颁发的一百多道新政“上谕”，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对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传播，以及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由于诸种建议被重视采纳，使康有为成为接近变法权力中心的重要人物。这种机遇本来应成为他更充分地施展才能、实现政治变革目的的“天赐良机”，然而，阶级、时代与个人品性诸方面的局限，使传统观念的“根”在此新的环境中萌发滋长，渐渐压抑排斥着革新思想与革新精神，并在实际行动中开始减缓了他的进取步伐。变法一举，成为康有为政治生涯的峰巅。不幸的是，这种极盛却成了他走下坡路的转折点，历史与康有为个人的悲剧也就在这轰动一时的政治变革高峰中悄

然开始。他在铭感“圣上”知遇之恩的思想推动下，由发动和依靠本来就十分狭隘的士大夫阶层，转而全力依靠既无实权又十分软弱的光绪皇帝，并抱定皇权主义，矢志终身。他的这种政治主张的更张，不仅大大削弱了变法运动的斗争锋芒，而且使改良派的社会基础更为薄弱。轰轰烈烈又空空洞洞的变法维新百日而亡，不能说与康有为个人，特别是他的上述观念的转变无关。同时，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充分表明，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仅仅依靠少数士大夫阶层乃至孤家寡人的开明皇帝，要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和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与梁启超流亡国外，“蹈日本而哭庭，走英伦而号救”。他们仍抱定“唯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的信条，拒绝与孙中山合作，继续宣传“保皇保孔”，“救国维新”的主张，成为保皇派的代表人物。

1905年同盟会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成为风云大势、时代主流。而与封建阶级千丝万缕的思想与政治联系，使康有为对革命的畏惧与仇视与日俱增。此时，三世三统、循序遽进的进化思想转而变成了反对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他指斥民主革命必引起内乱，必招致瓜分。这样，他便身不由己地一步步偏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甚至悖逆而动，开始了他为时人所指斥、为后人所惋惜的后半生。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革命的果实很快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重建封建专制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成为历史的中心课题。此时，任何企图恢复皇权、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不仅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必然会滑向封建专制的泥潭。辛亥年间，康有为与梁启超企图“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正是由立宪保皇、反对革命最终转向投

靠军阀势力，复辟封建帝制的发端。

1913年，他奔母丧返国，拒绝了袁世凯入京的邀请，留沪创办《不忍》杂志。此时，他已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进步思想，找不到向前发展的出路，只能向孔孟圣学中拾取“牙慧”，作为反对民主革命、主张复辟帝制、实行“虚君共和”的旗帜和精神支柱。

思想的尊孔复古和政治上的投靠封建军阀，服务于复辟帝制、虚君共和这同一目的。1917年的丁巳复辟是为实现这一目的演出的一场闹剧。至于本书记载的康有为1923年西游长安，谒吴（佩孚）访刘（镇华）只是丁巳闹剧的又一续曲罢了。自丁巳后，无论是新旧民主革命的交替、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新潮流的发展等等，都未能使他从这条通向帝制的道路中跳出。1927年，这位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维新勇士，竟以封建遗老的身份资志而歿，把他的交织着多重色彩的一生与思想留给了后人去评论。

康有为的一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和经历的曲折道路。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以赤诚的爱国之心，“上书痛哭，前席慷慨，谓瓜分迫于眉睫，非维新无以自强”（梁启超《公祭康南海先生文》），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救亡图新的政治与文化运动，向着腐朽的势力，腐败的制度发起了猛烈冲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建树了不朽的功勋。然而，处在新旧民主革命之交，两个时代，两种思想体系的并存，又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特殊的“二元”式人物：当社会进步运动尚局限于一定层次与范围时，他们在这特定的界域内，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阶级，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驰骋呼啸，所向披靡，表现出了凌厉的思想锋芒与勃勃英气；

当时代前进一步，变革走向更深的层次、更广袤的领域时，与旧时代的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使他们的思想逐渐跟不上时代前进的脚步，与新起的历史主题显现出越来越大的距离。迷惘、困顿，乃至落伍颓唐——他们的前半生否定了旧时代，他们的后半生却为新时代所否定。正是这种“否定之否定”，铸成了康有为的充满内在矛盾、对立的一生。这样集革新与保守、喜剧与悲剧的一生，曾引起后人无数的感叹，发人深思亦催人自省——不能清醒地认识现实、认识自己，不能正确地择任符合历史潮流的社会角色，再杰出的人物也不免会为历史所抛弃！

对康有一生的评价，曾引起学术界较多的争论。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诸种原因，这种争论还进行得不够深入。特别是对康有为的后半生，他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活动，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当然，本书只是一些追述性的文字，并非想对康有为的后半生进行细致地考查、论证和提出自己的见解与判断。这里，我只想对个别问题表述自己的一点肤浅看法。

几十年来，在对康有一生的政治思想进行研究与评价中，肯定他的前期，否定他的后期，似乎已成定论。然而新的思维环境，新的分析角度，和对历史运动的更深刻地思考，常常把许多已被人们认为不成问题的问题翻将出来，给予再认识。在康有为后期政治思想中，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忠君保皇思想——这点无疑对个人是狭隘的，对社会进步来说是有害的；另一点是以循序嬗进的进化思想为基础的“虚君共和”主张——此一点是否就是绝对错误乃至“反动”的，却值得重新考虑。当然，这样来谈问题不免会使人联想起对陈独秀“不断革命”和托洛茨基“二次革命”论的批判。由于这种联想常使理论思

维不免有所踌躇，因为再向前有可能涉及更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况且，既然历史不能随意假定也难以假定，人们也不应轻率地沿着假定的思路作另一种推理和判断，这就使人们对康有为“虚君共和”思想的评价呈现不十分理想的“一律”现象——一律斥之为“反动”。对于这一问题与上述看法，我认为，康有为主张中的“虚君”是一种外在形式，嬗递进化是内在本质。这种以嬗递进化为本质的政治主张，作为期冀中国独立、富强、走向光明的一种探索 and 追求，不应轻率地予以全盘否定。就是说，在探寻使中国摆脱黑暗，走向光明的过程中，可能有多种思路，康有为的主张即是其中的一种。尽管与孙中山的主张相比，其表现出保守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康有为的主张是一种对历史进步的反动，也不意味着“共和革命”与“虚君共和”是一种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

不过，遗憾的是，这种从本质上欲求中国独立、富强、进步、光明的主张，却与复辟帝制相结合，并寄附于封建军阀势力，以致酿成康有为后半生落伍、颓唐，悖逆时代潮流的悲剧。

本书记载的正是这悲剧中的一个片断。

目 次

前言

第一章 康有为来西安·····	(1)
第一节 西来时的陕西·····	(1)
第二节 来西安的原因·····	(4)
第二章 入陕纪盛·····	(10)
第三章 在西安的讲演(上)·····	(20)
第一节 宣扬君主立宪·····	(21)
第二节 侈谈天游、电通·····	(24)
第四章 在西安的讲演(中)·····	(33)
第一节 扬孔论儒·····	(33)
一 扬孔·····	(33)
(1) “神明圣王”·····	(36)
(2) “创教主”·····	(39)
二 推崇先秦两汉大儒·····	(44)
三 论唐宋诸儒·····	(45)
第二节 宣扬“三世说”与“大同”思想·····	(52)
一 康氏“三世说”的依据与目的·····	(54)
二 康氏“三世说”与公羊、董子说法的异同·····	(59)
三 康氏“大同”说·····	(61)
第三节 论天命、礼、性与道德·····	(70)

一	天命观	(70)
二	“礼”是普遍的法则	(71)
三	“性为生之质”	(73)
四	道德的标准	(74)
	(1) 仁 (2) 孝 (3) 中庸 (4) 至诚	
第四节	诸天各教与孔教	(83)
一	婆罗门教与孔教	(83)
二	佛教与孔教	(85)
	(1) 佛之大小乘与密宗	(86)
	(2) 佛始入中国与以后之盛衰	(88)
	(3) 康有为之选经与发愿	(88)
三	耶教与孔教	(92)
四	日教与孔教	(94)
五	回教与孔教	(96)
六	道教与孔教	(98)
	(1) 儒生与道士	(100)
	(2) 老聃与老子	(101)
	(3) 道教符箓说之始创	(101)
	(4) 道教符箓说之盛行	(102)
	(5) 修炼说之创始者	(102)
	(6) 修炼说之盛转与三教合流	(102)
第五章	在西安的讲演(下)	(104)
第一节	讲求科学, 发明新器	(104)
第二节	对学生与民众的希望	(109)
第三节	对女界的希望	(114)
第六章	西安酬酢、访古与题字	(122)

第七章	游城南名胜	(128)
第一节	终南樊川述古	(128)
第二节	览胜赋诗	(130)
一	晚宿留村	(131)
二	游五佛殿、紫竹林	(132)
三	夜宿南五台	(133)
四	入樊川，游兴教寺	(136)
五	游华严寺、杜工部祠、牛头寺、宿太乙官	(140)
六	登山	(142)
七	返游兴善寺、小雁塔	(143)
第三节	蒋古菴之死	(146)
一	蒋康关系	(146)
二	为康游山清道与蒋古菴之死	(146)
第八章	游渭北诸县	(149)
第九章	“盗经”风波	(153)
第一节	几种不同的说法	(153)
一	马凌甫的说法	(155)
二	郑志毅的回信	(156)
三	刘安国的答问	(158)
四	孔伏园的调查	(159)
第二节	几点浅见	(160)
一	康氏游卧龙寺的时间	(160)
二	藏经的版本问题	(161)
三	舆论之争	(161)
四	对“盗经”风波的看法	(162)

第十章 离陕·····	(163)
-------------	-------

第十一章 鲁迅论康有为述略·····	(168)
--------------------	-------

第一节 对康有为前期的评论·····	(168)
--------------------	-------

一 反对骂康有为·····	(168)
---------------	-------

二 赞同变法·····	(169)
-------------	-------

三 反对借“康党”杀人·····	(170)
------------------	-------

第二节 论晚年的康有为·····	(171)
------------------	-------

一 反对他的跪拜主张·····	(172)
-----------------	-------

二 对康有为的“虚君共和”的评论·····	(173)
-----------------------	-------

三 反对康有为的“弑君”之论·····	(178)
---------------------	-------

四 不提名地反对康有为在西安的讲孔·····	(179)
------------------------	-------

五 对康有为“大同”幻想的评论·····	(181)
----------------------	-------

六 评论康的“拉车屁股向后”·····	(183)
---------------------	-------

附录:

一、《康有为先生墓志铭》·····	(186)
-------------------	-------

二、《康南海先生长安演说集》·····	(188)
---------------------	-------

三、康有为来西安部分活动日程表·····	(245)
----------------------	-------

参考资料举要

后记

跋尾